

日本学界关于明清时代

宗族问题的研究

井上 彻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因与近代资本主义的接触为契机发生了历史上少有的变化。在这个激动人心的动荡时代，有关中国社会，欧美、日本等海外学者以及接受了欧美研究方法的一些中国学者都指出在中华南部地区普遍地存在着以宗法原理组织起来的，有族谱、祠堂、族田的亲族集团（宗族）这一社会现象。他们都认识到了存在这种社会现象的中国与欧洲、日本社会的不同。最近，日本学术界再度注意到了这种“不同”，其中著名学者沟口雄三提出了应该弄清直到近代为止，中国与欧美、日本“不同”的“基体”是什么这一认识（沟口雄三 1989）。这反映了日本学术界从更深层次上探讨中国社会结构，重新审视、解析中国社会的愿望。研究前面已经提到的宗族问题，自然成为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基体”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宗族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就其过程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往有把宗族作为中国社会“停滞”论的有力论据的观点，这一时期的研究从批判这个观点出发，通过对具体资料的研究，得出了以宗法、族谱、祠堂、共有地为特征的宗族起源宋代的结论（1940，50年代）。第二个时期：与战后主流史学意识“世界史的基本法则”的阶级论相适应，试图阐明起源于宋代以后宗族的历史特质。这一时期的主流认识是仁井田升提倡的所谓“同族”共同体论，即他主张，在唐末变革时期抬头的地主=官僚层，为了缓和同族内部发生的地主与佃户等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作为保障下层农民再生产的机构，建立了宗族组织（1950年代到70年代）。第三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学界对“世界史的基本法则”持怀疑态度，宗族研究也与学界这一动向相应。学者们试图通过研究宗族问题，阐明中国社会的固有结构。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从地域社会、乡绅、市场圈、徭役制度、移居、戏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1970年代后期到现在）。本文主要想介绍第三个时期研究的到达点，所介绍的内容以明代后期为中心，同时提出笔者有关宗族问题的观点。另外，最近日本研究界受欧美研究的影响，同时吸取了中国大陆、台湾的研究成绩，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本文限于篇幅不作介绍。请原谅。

一 宗族发展的现象

第一,二个时期的研究,清水盛光,牧野巽,仁井田升等已经认识到了起源于宋代的宗族到了明清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在第三时期,提出了明代后期(或明末清初)在宗族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重要观点。森正夫提出“地域社会”概念以来,日本研究界普遍接受了通过地域社会的研究,能够弄清中国特殊构造的观点。第三期的研究也受这种地域社会论的影响,注意对各个地方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包括,上田信以浙东地区为对象,从移居和农业开发的观点论述了加强宗族组织的动向(1983、84、89),井上彻主张明代后期的宗族发展是华中华南的普遍现象,同时具体分析了广东、苏州的情况(1987、89、94a),铃木博之对徽州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1989、92),田仲一成对广东和徽州地区研究后指出了明代后期的宗族发展状况(1989b、1991)。这些研究对明代后期以来的宗族,特别是南方宗族予以充分重视。

日本研究界对明代后期宗族发展现象重视的原因是,各个地区都比较普遍地开展了以设置共有地,编辑族谱,建设祠堂等为共同特征的组建宗族的活动。如果将明代中期以前的宗族发展与清代宗族发展的情况相比较,就能很清楚地认识到明代后期在宗族发展史上的意义。从第一,第二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和所提示的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代以及民国时代,宗族在华中华南这样广大的南方地区普遍地发展。而第三个时期研究的重点则偏重于分析府州县等各地方宗族的实际状态。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华中华南的各个地区都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例如:浙东地区有上田信(1983、84、86、89),田仲一成(1989b),浙西地区有大谷敏夫(1991),远藤隆俊(1993),井上彻(1994a),徽州地区有田仲一成(1990)、铃木博之(1989、92)、臼井佐知子(1991、93),广东地区有,片山刚(1982),西川喜久子(1983·84、88、90、94),濑川昌久(1982、91),田仲一成(1989a 1992),井上彻(1989),广西地区有菊池秀明(1994),福建地区有三木聪(1986),四川地区有西川正夫(1987、90、92),山田贤(1987、89a、89b、91)。另外,法制史家滋贺秀三关于清朝法律和宗族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1984)。通过这些研究成果,我们能了解清代和民国时代宗族在地域社会紧密分布的情况。宗族在各地都比较普及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始于明代后半。

那么,明代中期以前的情况呢?目前学术界对明代前期宗族分布状况还不太清楚。在宋至元末,特别是南宋、元朝,在江南地区,有了设立义庄,编辑族谱,建设祠堂等事业发展的迹象(远藤隆俊 1988、90、93a、井上彻 1992、93)。笔者对元末明初的宗族问题非常重视。虽然能指出宗族事业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但是不能确认宗族在这一时期与

清代一样在各地紧密地分布着。这一时期，与宗族这一形式相比，更重要的是大家族这一形式。大家族是防止家族因家产均分继承而分裂的有效手段。小林义广，佐竹靖彦对宋代的大家族（小林 1982、90 佐竹 1990），檀上宽和笔者对元末明初浙东地区士大夫（地主）采用以浦江郑氏为标准的大家族形式进行了研究（檀上 1982 井上 1992、93）。而在明代，实施里甲制度下的农村地主（粮长）也选择了大家族这一形式（井上 1994a）。总而言之，从宋代到元末明初，组织宗族的事业主要局限于江南，而且基础还不太深厚。

二 分析的观点

回到本题上来。我们如何解释明代后期以来的宗族发展现象呢？对这一问题，学者们各有自己的见解，目前日本学界尚未形成共通见解，笔者基于以往自己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点论述。

笔者的研究从重新认识仁井田升的理论开始。仁井田升提出了同族“共同体”论，但他的见解和当时的宗族实际状态有很大的差别。宋代学者主张复活周代宗法，是基于如下背景。在科举官僚制度确立的宋代，以这个制度为存在前提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存在着因该制度的规定（身分限于一代）和均分继承体制（析产）而导致家族身分和地位没落（子孙没落）的问题。复活宗法的目的是，把亲族组织起来，建立宗族体制，以此防止家族身分和地位的没落，同时世代代官僚辈出，在科举官僚制度下实现“世臣”的理想。义庄（以苏州范氏为模范）、族谱、祠堂等事业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手段（井上 1987）。宋代学者的这一理想在宋代，元代还没有普及（井上 1992、93）。士大夫基于这个理想，大规模地组建和发展宗族这一形式正是在明代后期。这个时期的江南（苏州地区）苏州城的范氏，复兴了明代前半因国家政策而几乎解体的义庄，到了清代获得了史上空前的繁荣，同时，在苏州地区，府城、县城、农村（含有市镇），开始出现了设立义庄、编辑族谱、建设祠堂的活动。1930、40年代，有学者对苏州等江南地区进行调查后指出：在这一地区，存在着乡绅们的宗族以城市（城、镇）为中心紧密分布的现象。笔者推测这种现象始于明代后期（井上 1994a）。

那么，为什么明代后期以来宗族事业非常发达，而在江南地区扎根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当时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宗族集团在地域社会普及的前提是该地域社会内部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士大夫。在这个时代，乡绅对乡里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出现了、“士”的滞留现象（重田德 1971 森正夫 1980、1983 夫馬 進 1980、82，岸本美绪 1987、90 濱島敦俊 1989）。关于知识分子大量出现的背景，我们

从足立启二的研究中能得到启发。足立启二认为,明代后期农业集约化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是划时代的,以这个农业方面的根本变化为背景,新型的富农经营登场,富农经营的规模有一定的界限,超过了这个界限,他们就转化为寄生地主。于是就出现了经营和所有的分离(1982、87a、87b)。加上国内交易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商业资本的成长。非生产性地主、商人资本家(以及高利贷者)不断强化他们同官僚体制的关系。同时,社会思想也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这个时代,以任官为唯一成功道路的这种儒教思想广泛地渗透到普通人的心灵中,不论何种职业,他们都以任官为最终的目标。但是,明代后期大量登场的士大夫也和前代士大夫一样,存在着因科举官僚制度身分继承的限制和家产均分继承而导致家族衰落这一宿命性问题⁽³⁾(岸本美绪 1987、90 井上 徹 1994a)。即欧美研究界所谓“social mobility”(社会移动)或者说社会地位具有流动性这一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就出现了他们组建宗族的潮流⁽⁴⁾(井上徹 1994a)。

明代后期的宗族发展也在国家政策之中有反映。最近小島毅进行了有关儒教礼制问题的研究,指出明朝在嘉靖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礼制改革(小島 1992),在这个改革之中,礼部尚书夏言计划基于宗法观念改革家庙和祖先祭祀的制度(井上 徹 1994b)。笔者认为这个改革以明代后期组建宗族的潮流为背景。

三 关于宗族的广域普及

自第一个时期的研究以来,我们知道宗族分布有地域差别,即华南华中较华北宗族更为发达。在华中华南,宗族更为发达这一认识基于有关近代中国的调查报告,文献的研究也以这个认识为前提。为什么在南方宗族更为发展?要理解这个问题,须要采用宏观分析方法。如前所述的以江南为对象的研究所提示的城市化动向是解决问题的锁钥。关于这一点我们能参考宋代史家斯波义信提出的城市化理论以及明清时代史家的研究成绩。总而言之,16世纪以后,伴随着汉族向南方,西方的移居和开发的扩大,在这些边境地方,城市化进一步深化,同时联系各个远隔地区的交易和海外贸易也急速地发展起来(斯波義信 1988、92)。作为城市化的结果,在各个地方出现了士大夫的成长和以他们为中心的宗族普及的局面。典型的地域是华南珠江三角洲。在这个地区,明代中期到清代之间,以海外贸易,国内交易的发展为背景,商品经济急速地发展,这使它获得了能与江南地区媲美的经济地位。在珠江三角洲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佛山镇。明代后期,在“土著”家系之中,通过手工业、商业活动,获得经济利润而富裕起来的家族同时获得了官僚身分(乡绅),他们把财富投资于建设祠堂、编辑族谱等事业上,组建了宗族。紧跟其后的是那些渐渐移居“侨寓”的乡绅和富裕家族也树立了宗族体制,在清代,包含“土著”,“侨寓”,这些有势力的宗族(官族)继续不断

犬馬進

1980 「明末反地方官士変」『東方学報・京都』52。

1982 「同善会小史」『史林』65-4。

濱島敦俊

1987 「中国中世における村落共同体」『中世史講座』2 学生社。

1989 「明末江南郷紳の具体像」『明末清初期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90 「明清時代、江南農村の『社』と土地廟」『山根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汲古書院。

井上 徹

1986 「黄佐『泰泉郷礼』の世界」『東洋学報』67-3・4。

1987 「宋代以降における宗族の特質の再検討—仁井田陞の同族『共同体』論をめぐって—」『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12。

1989 「宗族の形成とその構造」『史林』72-5。

1992 「元末明初における宗族形成の風潮」弘前大学人文学部『文経論叢』27-3。

1993 「宗族形成の動因について」『和田博徳教授古稀記念・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汲古書院。

1994a 「宗族形成の再開—明代中期の蘇州地方を対象として—」『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18。

1994b 「夏言の提案」『中国における歴史認識と歴史意識の展開についての総合的研究』（科研費報告書 東北大学文学部）。

片山 剛

1982 「清末広東省珠江デルタの図甲表とそれをめぐる諸問題」『史学雑誌』91-4。

1982 「清代広東省珠江デルタの図甲制について」『東洋学報』63-3・4。

菊池秀明

1994 「清代広西の新興宗族と彼らをめぐる社会関係」『社会経済史学』59-6。

岸本美緒

1987 「明末清初の地方社会と『世論』」『歴史学研究』573。

1990 「明清時代の郷紳」『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問い7・権威と権力』

小林義広

1982 「宋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宗族と郷村社会の視角」『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8。

- 1990 「宋代における宗族と郷村社会の秩序」『東海大学紀要（文学部）』52。
- 小島 毅
- 1992 「嘉靖の礼制改革について」『アジアの文化と社会Ⅱ』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 1993 「地域からの思想史」『アジアから考える〔Ⅰ〕』東京大学出版会。
- 三木 聡
- 1986 「土地革命と『郷族』」『変革期アジアの法と経済』（昭和58—60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成果報告書）。
- 溝口雄三
- 1989 『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大学出版会。
- 森 正夫
- 1980 「明代の郷紳」『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77。
- 1983 「宋代以後の士大夫と地域社会」『中国士大夫階級と地域社会との関係についての総合的研究』（科研費研究成果報告書）。
- 西川喜久子
- 1983・84 「『順徳北門羅氏族譜』考（上・下）」『北陸史学』32・33。
- 1988 「順徳司練総局の成立」『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05。
- 1990 「珠江三角洲の地域社会と宗族・郷紳」『北陸大学紀要』14。
- 1994 「珠江デルタの地域社会」『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24。
- 西川正夫
- 1987 「四川省雲陽県雜記」『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科篇）7。
- 1990 「四川省瀘州覚え書」『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科篇）10。
- 1992 「四川省隆昌県郭氏箭記」『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科篇）12。
- 大谷敏夫
- 1991 『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汲古書院。
- 佐竹靖彦
- 1990 『唐宋変革の地域的研究』同朋舎出版。
- 斯波義信
- 1988 『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汲古書院。
- 1992 「移住と流通」『東洋史研究』51—1。
- 滋賀修三
- 1967 『中国家族法の原理』創文社。

地向国家和社会输送官僚等知识分子（井上徹 1989）。宗族普及的实际状态各个地方有差别，但总的来说，在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出现的国内交易，海外贸易的要冲，从流通过程提取经济利润的商人资本的根据地（故乡），在这些地方，乡绅、富裕家族等流行组建亲族的活动，这种时代潮流促进了宗族在广泛区域下的普及（井上徹 1994a）。

这里，我想介绍有关汉族移居和开发的观点。上田信以浙东地区为对象研讨唐末以来到清代，在这个地区的移居和开发，关于这一问题，上田的主要观点，第一，他认为伴随着移居和开发过程产生了“同族集团”，同时他还探讨“同族集团”和地域社会的关系。第二，到了16世纪，有族谱、族田等的宗族在地域社会登场。上田认为这种宗族是“同族集团”强化的结果。那么“同族集团”变成宗族的契机又是什么呢？他推测是为了解决水利纷争等各种问题（上田 1983、84、89）。人类学者瀨川昌久也注视移居和开发问题，但是他的见解和上田信有分歧。瀨川否定以农业开发为宗族成立契机的这一认识。他认为移居当初在地域社会成立的是复姓村落，然后有力宗族渐渐抬头，该宗族通过参加科举考试等与国家机构产生了很紧密的联系（瀨川 1982、91）。山田贤也注意到了移居和开发问题。山田同意瀨川昌久的部分意见，即移居当初组成的是复姓村落，其中的有力“宗族”登场，然后“宗族”再度编制为宗族。他所指的宗族即笔者所主张的该宗族。总而言之，山田贤的观点，结合了瀨川昌久、上田信、井上彻等的见解（山田賢 1987、89a、89b、91）。

如何评价移居和开发史研究中提出的同姓亲族呢？滋贺秀三认为有血缘关系、配偶关系的叫亲族，即汉语的“亲属”，但是在给中国社会的亲族关系下定义之际，要排除女系，而重视的是父系亲族，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宗族”“同族”“族人”“族党”等概念就是父系亲族的反映（1967）。宋代以来汉族知识分子以组织父系亲族作为理想，即本文使用的宗族。我认为移居和开发史所重视的亲族和通常意义上的宗族在含意上是有差别的（井上 1987）。例如，苏州有所谓“聚族”现象，但聚族的各姓所崇拜的是民间信仰中的神灵等，对祖先崇拜不太关心⁽⁵⁾。较父系亲族，有更重视妻子、母亲、祖母等姻戚关系的倾向。笔者认为，中国社会虽有各种亲族，但只有在知识分子的指导下，各种亲族才可能组织起来（井上 1994a）。小島毅提出了到明代后期，儒教伦理（礼教）才渗透于民众中这一值得重视的见解。儒教伦理中，重要的是基于朱子“家礼”设立祠堂，进行祖先祭祀，操办丧事等风俗（小島 毅 1993）。我认为这种风俗变化与宗族发展有密切关系。即在宗族组织发展之下，伴随着儒教伦理的渗透，中国社会产生了更加重视父系亲族的观念。

最后，介绍人类学者竹村卓二的见解，他分析了瑶族的“家先单”，“家先单”相当于汉族宗谱中的系谱和墓志。瑶族在“汉化”过程中，采用宗谱的形式作成“家先单”，但他们不是“汉族化”的，瑶族的亲族组织以合同家族为中心，与汉族的宗族不同（竹村卓二 1

994)。这是很令人感兴趣的意见。少数民族采用宗谱、祠堂、祖先祭祀等儒教习惯，同时又保持了自己亲族的独立性。这个现象表明在汉族宗族普及的过程中，也有与基于宗法观念的宗族组织不同的亲族组织出现。

<附记>这篇论文是1994年8月在西安召开的中国社会史学会暨“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报告。

【註】

- (1) 笔者已经介绍了到80年代为止的有关研究动态(1987)。
- (2) 『1981・中国史シンポジウム 地域社会の視点』名古屋大学文学部東洋史学研究室 1982年。
- (3) 寺田浩明从法制史的角度研究了以社会移动为前提的中国法律特殊的性格以及农业经营和土地所有的关系(1989、94)。
- (4) 大谷敏夫介绍嘉定县钱氏形成宗族的事例的是很值得重视的(1991)。另外，奥崎裕司指出嘉兴府的“血缘网和姻戚网”是乡绅具有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是很有启发性的(『中国郷紳地主の研究』汲古書院 1978年)。
- (5) 滨岛敦俊研究了江南地区的民间信仰与市场圈的关系(1987、89、90)。

【文献目録】

足立啓二

- 1982 「清代蘇州府下における地主的土地所有の展開」『熊本大学文学部論叢』9。
- 1987a 「宋代以降の江南稲作」『稲のアジア史』2。
- 1987b 「中国中世における農業の展開」(足立啓二・大沢正明共著)『中世史講座』2。

檀上寛

- 1982 「元明交替の理念と現実」『史林』65—2。

遠藤隆俊

- 1988 「范氏義荘の変遷」『集刊東洋学』59
- 1990 「范氏義荘の諸位・掌管人・文正位について」『歴史』74。
- 1993a 「宋末元初の范氏について」『宋代の知識人』(宋代史研究会報告第4集)汲古書院。
- 1993b 「清代蘇州の歲寒堂」『集刊東洋学』69。

1984 『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創文社。

重田 徳

1971 「郷紳支配の成立と構造」『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12（岩波書店）。

瀬川昌久

1982 「村のかたち」『民族学研究』47-1。

1991 『中国人の村落と宗族』弘文堂。

鈴木博之

1989 「明代徽州府の族産と戸名」『東洋学報』71-1・2。

1992 「清代徽州府の宗族と村落」『史学雑誌』101-4。

1994 「明代における宗祠の形成」『集刊東洋学』71。

竹村卓二

1994 「ヤオ族の〈家先単〉とその運用」『儀礼・民族・境界—華南諸民族「漢化」の諸相—』風響社。

田仲一成

1989a 『中国郷村祭祀研究』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1989b 「蕭山県長河鎮朱姓祀産簿解剖析」『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08。

1990 「明代江南における宗族の演劇統制について」『山根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汲古書院。

1991 「華南同族村落における祭祀儀礼の展開」『中国研究集刊』1991年号。

寺田浩明

1989 「中国近世における自然の領有」『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問い1・歴史における自然』岩波書店。

1994 「明清法秩序における『約』の性格」『アジアから考える〔4〕社会と国家』東京大学出版会。

上田信

1983 「地域の履歴—浙江省奉化县忠義郷—」『社会経済史学』49-2。

1984 「地域と宗族—浙江省山間部—」『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94。

1986 「村に作用する磁力について（上）（下）」『中国研究月報』455・456。

1989 「中国の地域社会と宗族—14-19世紀の中国東南部の事例—」『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問い4・社会的結合』岩波書店。

白井佐知子

1991 「徽州商人とそのネットワーク」『中国—社会と文化』6。

1993 「徽州汪氏の移動と商業活動」『中国—社会と文化』8。

山田賢

1987 「移住民社会と地域変動」『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12。

1989a 「清代の地域社会と移住宗族」『社会経済史学』55—4。

1989b 「清代の移住民社会」『史林』69—6。

1991 「中国移住民社会における地域秩序の形成」『アジア史からの問い』山川出版社。